

#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与“四维模型”

潘祥辉

**摘要:** 参考相关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以及张旭昆的制度演化理论,联系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实际,本文建构起一个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媒介制度环境”、“媒介制度变迁的主体”、“媒介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变量”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外源性变量”,四者构成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媒介制度变迁可以从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开始演化。四个维度中的变量可能单独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某一层面,也可能同时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三个层面,这个过程呈现动态性。四维模型可以分析具体的媒介制度变迁的情境与案例,揭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

**关键词:** 媒介; 制度变迁; 动力; 四维模型

**作者简介:** 潘祥辉,男,副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2010)05-0001-07

## 一、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是对考察导致制度变迁的因果原理的物理学类比。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制度变迁的现象视为结果,那么任何导致制度变迁的因素都可以视为制度变迁的动力。<sup>[1]</sup>媒介制度变迁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媒介制度与其他因素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形态及媒介制度的演化,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媒介制度安排,媒介随政治演化而演化,如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就指出:唯有冻结社会制度的基本假设,才可以谈客观、平衡这些“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sup>[2]</sup>。塔克曼(Gaye Tuchman)认为:整个新闻网都环绕着合法的中心机构,新闻节奏跟官僚机构的运转同声共气,以致支配性的观点弥漫于主流媒介,抹煞甚至消灭社会上的异见。<sup>[3]</sup>也有学者认为媒介的经济所有权决定了媒介的制度安排<sup>①</sup>,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有权决定媒介制度;也有认为是媒介技术决定了媒介制度的演化,媒介的技术变迁是媒介制度变迁的根源;还有认为是制度的收益结构决定了媒介制度的变迁,如果有获利机会的存在,且实施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的话,制度创新就会发生。笔者将把媒介制度安排归

<sup>①</sup> 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较为激进。李金铨称之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economic” politiceconomy)。他们抱持激进的人文主义理想,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背叛民主的理想,特别是“军事与工业复合体”肆无忌惮地追逐经济利益,制造文化霸权,导致“不完全的解放”和资源分配失衡,以至于扭曲“公共领域”。激进派学者批评多元主义者太注重国家与媒介的关系,而忽视资本主义私有化对传播工具的影响。但激进派马克思主义谈到国家政权时立场迥异:工具派学者认为国家权力迳自为大公司的利益服务;其他人认为只有国家足以挑战大公司的利益,只有国家才能促成社会财富的公平再分配。为此,后者鼓吹国家应该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矫正市场对公共表述所产生的扭曲,例如汤普森(John B. Thompson)主张国家干预媒介的产权秩序,以营造“管制的多元”(regulated pluralism),莫斯科(Vincent Mosco)也呼吁批判派学者要分析国家如何干预传播工业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见李金铨:《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21世纪》二〇〇三年六月。

结于单一因素的观点称之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单因素决定论”。

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单一决定论相反的是综合决定论：即认为媒介制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发展与演化也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李良荣就认为，“不同的新闻体制是由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新闻体制本身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其新闻体制的基本内涵不会改变。”<sup>[4]</sup>英国大众传播学者麦奎尔在论及媒介体制时看到了政治、经济与技术这三个维度的综合影响。他认为，“传播体制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性，关键在于它的行动无法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且非常依赖技术的不断变化。”<sup>[5]</sup>因此，他认为“可以将媒介定位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这三种力量之间”。

相比较于麦奎尔只注意“政治、经济与技术”的三个维度，英国学者巴勒特则看到了更多的影响因素，他的“媒介——社会关系模式”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政治、经济与技术这三种因素外，媒介制度还受制于其他变量，如下图所示<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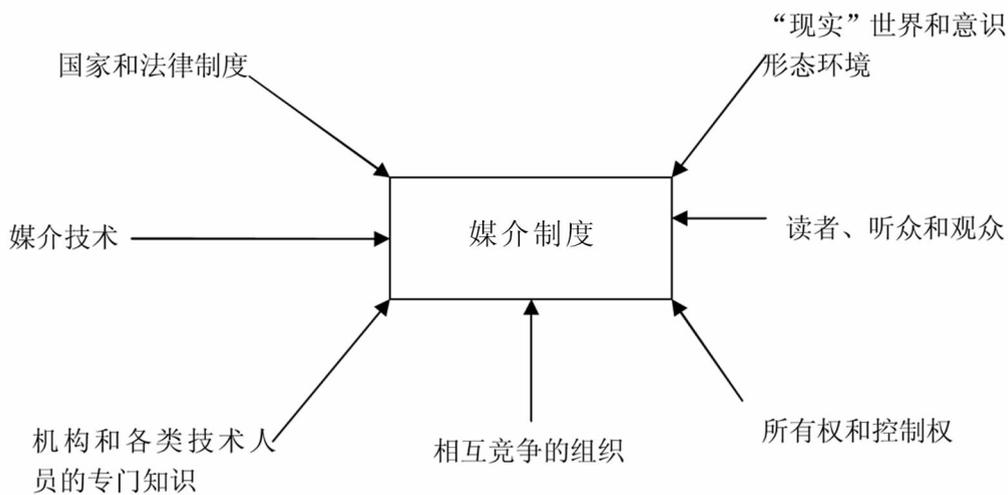


图1 巴勒特的媒介——社会关系模式

巴勒特的模式显然比麦奎尔的模式要更为详尽，可以看到，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技术的以及受众和其他组织等都对媒介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有着重要的制约与影响。这种认识观是比较符合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实际的。制度是一个多层级的概念，媒介制度本身是一个制度系统，它从属于更大的社会制度系统，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从横向来看，媒介制度系统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其他制度系统有着较强的耦合关系，当任何一个制度系统发生演化的时候，其他制度系统也会发生相应的演化。这其中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耦合程度高，所以它必然随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变迁。此外，媒介的所有权、媒介的受众结构、媒介技术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也制约着媒介的制度变迁。特别是知识存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巴勒特这一模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注意到了意识形态对媒介制度的影响。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知识与观念的确构成了对制度变迁的一种软约束。制度分析流派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时就特别强调集体行为中共享的价值、意义及人们的习惯的重要性。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含着为人类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他们认为，制度影响、制约甚至决定行为的方式在于，为特定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提供了某种内在化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模板，即指明行动者在特定情景下把自己想象和建构成何种角色。<sup>[7]</sup>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文化和观念的变迁

很容易传导到制度变迁上来，符合某种“共识”的制度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反之，社会共识发生了变化，制度演化就会变化，变迁会更加容易或更困难。这就是近代为什么经过西方传教士、维新派的倡导与启蒙，当社会接受了“媒介是社会公器”等观念后，媒介大大加快了它摆脱管制的进程，最终摆脱集权管制的重要原因，民国以后，“媒介是社会公器，行使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样的“共识”仍然在广大的社会人群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起作用，因此，任何政权压制媒介都会遭到千夫所指，专制政权管制媒介变成一件很不容易且代价高昂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看到，巴勒特的模式毕竟不是用来解释媒介制度变迁的，它描述的只是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各种影响因素其实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且这种描述只是一种静态的呈现，对于各种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起作用，作用于媒介制度的哪个层面，该模式无法描述。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模式进行修正。

## 二、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学者柯思乐（S. D. Krasner）看来，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Krasner认为，一个长时段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会有许多均衡点出现，它们或长或短，只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他把这种均衡称为“断点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sup>[8]</sup>。那么，制度从均衡状态向非均衡演化是什么原因促使的呢？Krasner认为是源于“危机”驱动，危机发生的时刻相当短暂，主要是因为制度内部既存的矛盾冲突或外在环境的改变到达了临界点的状态，一旦遭遇特定突发状况的刺激，造成制度内部控制能力或应付外在环境能力降低。因此，制度必须产生改变，以化解内部冲突或外在环境压力的冲击。

L. E. 戴维斯和 D. C. 诺思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中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制度分析的范式。他认为制度变迁应该关注以下几个变量：一是“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二是“一项制度安排”，即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一种方式的一种安排，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久的；三是“初级行为团体”，即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正是行动团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入（这些收入是他们的成员现在不能获得的），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且在这一模型的逻辑内，团体启动了安排创新的进程。四是“次级行动团体”，这也是一个决策单位，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变迁。五是“制度装置”，这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sup>[9]</sup>

在制度演化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张旭昆教授则认为，制度系统的演化可以根据“双适态”<sup>①</sup>或稳定均衡状态是否发生变化分为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稳定均衡不发生变化的是为“短期分析”，发生变化的是长期分析。短期内的制度演化主要是制度系统的内源演化在起作用。制度系统内源演化指“由于制度系统内部的不适调引起的演化。即一些具体制度之间相互排斥，引起某些具体制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引起连锁反应，造成与它们有耦合关系的一系列制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制度系统趋向既定的（潜在的）双适态或稳定均衡状态。”<sup>[10] (269)</sup>

张旭昆教授认为，短期内决定制度系统演化的因素有五个：一是制度系统的初始状态的令人满意程度；二是制度系统演化的起点，它决定了制度演化过程的具体内容；三是制度系统的关联性，它描

<sup>①</sup> “双适态”指制度的“适调态”和“适意态”。张旭昆认为制度的一般均衡指制度“既适调又适意的状态，简称双适态”。适调态是指制度系统中任何两种制度之间都不存在互斥关系，而是处于相互适应协调的状态；适意态是指制度系统能够适合每个人和群体的意愿。见《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202页。

述了制度系统的静态结构特征。在认知无误的前提下，影响到各类制度系统的演化方式和演化过程。四是各项制度的演化是否具有帕累托性质。在现实生活中，整个制度系统的演化都具有帕累托性质是很少的，只要制度系统中有一项制度的演化不具有帕累托性质，整个制度系统的演化就是非帕累托的。这反映了制度系统的动态特征。五是人们对制度系统的关联性和演化的帕累托非帕累托性质是否具有正确统一的认识。认知无误，共识一致有助于进行理论考察，但却与现实不符；对制度演化帕累托和非帕累托性质的认知失误，会影响到认知主体所取的态度、力量对比和成功的概率等；对制度结构关联性特征的认识失误，会影响到制度系统演化方式和步骤的选择。<sup>[10] (282-347)</sup>

关于长期内制度系统外源演化的理论，张旭昆教授认为，“制度系统外源演化是指一些非制度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制度系统双适态或者稳定均衡状态的变化。这些非制度因素有两类，一类是均衡性因素或者负反馈因素，它是既定制度系统的稳定力量；一类是积累性因素或者正反馈因素，是引起既定制度系统双适态变化的基本力量。”这类因素有人口因素、技术进步因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因素，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变迁，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等等。张旭昆教授对于制度演化的分析对于我们建构媒介制度变迁的模型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他将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区分为“内源性因素”（内生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外生因素），由此将制度演化分为内源演化理论和外源演化理论，十分简洁明了。

参考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以及张旭昆的制度演化理论的描述与分析，结合传播学者对媒介制度的阐释，联系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实际，笔者建构起一个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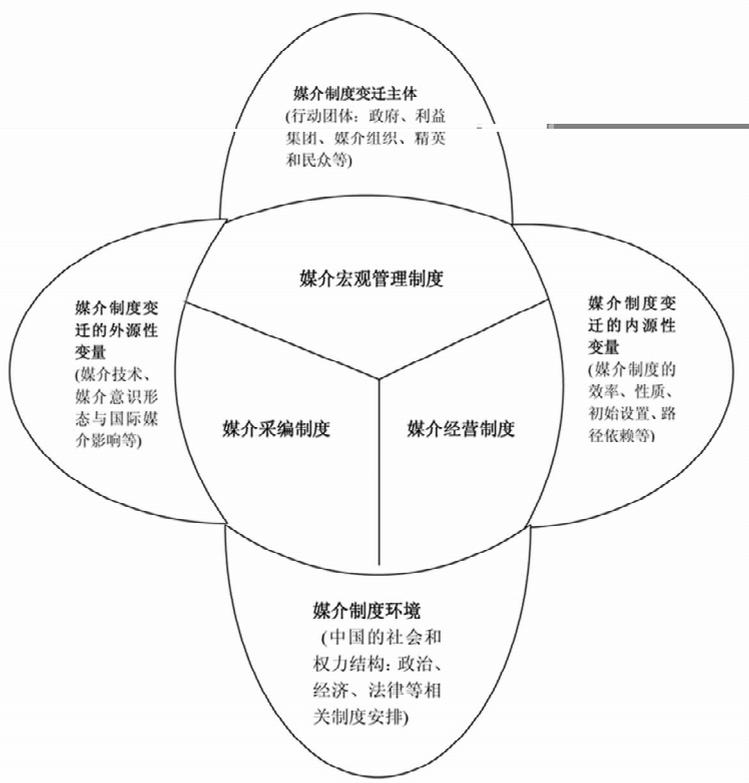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

模型第一个维度是“媒介制度环境”，这相当于诺思所讲的“制度安排”，即媒介制度所置身的更大的制度系统，它与这些制度系统或者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存在耦合关系，每一个制度系统的设置情

况与演变都会对媒介制度构成约束。这个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安排、经济体制安排、法律与政策以及社会结构等；第二个维度是媒介制度变迁的主体，即行动集团，相当于诺思模型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它代表了制度变迁中的最具主观能动性的一极，如果说“媒介制度环境”相当于“结构”因素，那么媒介制度变迁主体就是“行动”因素。既重视“结构”又重视“行动”是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工具的优势所在；第三个维度是“媒介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变量”，这直接受到张旭昆先生关于“内源性演化与外源性演化”的启发。内源性的变量包括媒介制度的初始设置、路径依赖、均衡状态，媒介制度本身的结构、效率、功能等，对内源性变量的分析主要是对媒介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分析和媒介制度报酬结构的分析；第四个维度是“媒介制度变迁的外源性变量”，指能够引起媒介制度变迁的外部因素，包括媒介技术变迁、外国力量或说国际体系的影响，以及媒介知识的积累及媒介意识形态的变化等，这些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非常重大，它通过扮演“旧有制度挑战者”的角色，给原有的媒介制度安排以冲击，打破原有的媒介制度均衡，引起媒介制度的调适与演化。这四个维度的各种变量可能单独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某一个层面，也可能同时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三个层面，打破旧有的媒介制度形成的均衡，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这种“打破均衡——恢复均衡”的过程就是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是各种变量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结果。在具体的媒介制度变迁的情境与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模型来分析哪些因素起了哪些作用，这些变量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媒介制度变迁的，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内部演化机制的揭示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媒介制度变迁可以从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开始演化。汪丁丁在论及社会制度变迁时说：任何一个社会，按生命形态分成五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道德共识及规范；较低的层次是订立宪法原则及相应的具体规则；第三个层次是政府形态，即政策制度的层次，第四个层次是经济规则和交换，最表面的层次是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社会制度的演化，可以从这五个层次中的任何一个层次的变动开始。<sup>[11]</sup>显然，我们也能够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这“四维模型”中发现：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变化都可能引起媒介制度的演化，也即是说，这种演化可以从任何一个维度开始。例如，晚清的媒介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势力启动的，西方势力作为一种外部挑战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包括媒介制度在内，这显然是一种从“外源性因素”引发的制度演化；而中国第一部新闻法的出台则是“清末新政”时期政治制度改良衍生的产物，是从“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演化的；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第六条：“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自由主义的媒介理念制度化，这种制度变迁既是由“制度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行为主体博弈的结果，还可以认为是“媒介理念”演化的自然结果；1949年的媒介制度变迁是从“制度环境”的演化引发的，但1978年以后的新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制度本身的效率所引发的，与其说是政府政策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媒介改革，不如说是媒介制度安排本身的负效应与高成本导致的制度危机引发了媒介的“自发改革”。可见，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经验来看，媒介制度的变迁可以从任何一个维度开始演化，但实际上这种演化往往不是单一维度决定的，媒介制度的变迁总是在同一时期，在多个维度的变量同时演化、互相交错的情况下开始演化的，它既作为“因变量”存在，也作为“自变量”存在，这种复杂的“综合”演化增加了我们分析其演化机制的难度。

### 三、近代以来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驱动机制及其描述

参考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将结构变量与行动变量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找出近代以来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约束变量与动力变量，还原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近代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

变迁可以简要概括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驱动机制

|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时段 <sup>①</sup> | 媒介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动力机制)     | 主要行动团体(行为变量)            | 行动团体对媒介功能的认知(行为逻辑)            | 其他约束变量   |
|--------------------------|----------------------|-------------------------|-------------------------------|--|
| 近代(1815—1911年)           | 救亡危机                 | 知识精英                    | 启发民智以改良社会的工具                  | 权力结构<br>社会结构<br>经济结构<br>媒介传统<br>媒介意识形态<br>国际制度体系<br>技术体系 |
| 现代(1911—1949年)           | 救亡危机<br>阶级斗争<br>媒介竞争 | 政党<br>知识精英<br>商业精英      | 文人论政工具<br>营业之用<br>党的喉舌        |  |
| 当代(1949—1978年)           | 阶级斗争                 | 中国共产党                   | 阶级斗争之工具<br>党和政府之喉舌            |  |
| 1978年以来                  | 利益博弈                 | 中国共产党<br>媒介组织<br>其他利益集团 | 政治稳定之工具<br>改良社会之工具<br>谋利晋阶之工具 |  |

近代媒介制度变迁是由危机驱动的，即民族救亡的危机。当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以这种方式逼迫中国“开放”并加入“全球”秩序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民族意识就开始被唤醒。按照汤因比和费正清关于历史变迁中的“挑战与应战”的原理，19世纪列强的入侵无疑拉开了中国的“应对挑战”的过程，从外部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这种“应战”的中国百年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媒介就是在这种“应战”与“改革”中诞生的。在近代的媒介制度变迁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人最早创办成功的现代报纸《循环日报》的创办者王韬即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与办报实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如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后来革命派知识分子章太炎等人。在中国媒介管理制度上，要求开报馆，制定报律以保护新闻自由、倡导媒介以监督政府等都是知识分子在推动。没有知识分子的推动，就不会有清末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法。在近代知识分子的手里，中国的媒介完成了从古代报纸向现代报纸的转型。出现了像《循环日报》、《强学报》、《时务报》这样的精英报刊和政论报刊，在版面编排、发行上也实现了向报纸的“现代化”。

1911—1949年期间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知识分子仍然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呼吁民主法治，争取新闻自由，开创了“文人论政”的新范式，推动了中国现代媒介的成熟。但这一时期，政党政治开始在中国出现，政党不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变迁的主要力量，也成为媒介制度的供给者与施行者。继国民党打败封建军阀完成了对中国的形式上的统一后，国民党的国家全能主义开始在中国推行，在媒介体制上，国民党推行法西斯式的集权主义管制模式，尽管由于其政治控制力的有限，并不能完成改变媒介演化的方向，但政党力量的兴起极大程度影响了媒介制度的演化。从媒介形态上看，晚清以来的由政论媒介发展而来的政党媒介在民国的多元媒介形态光谱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政党媒介的一种形态表现为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党营媒介，另一形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媒介，后者打破了国民党媒介管制的封锁，在解放区及国统区落地生根，在这两极媒介之外，自晚清以来的文人论政型媒介（精英媒介）和商业媒介依然在夹缝中发展，商业媒介之间的竞争一度活跃，对中国媒介的管理、采编及经营制度的改进和发展影响巨大，甚至直接促成了国民党党营媒介《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改制。

① 本文依媒介制度的演变将近代以来的新闻史划分为四个时段：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到1911年旧的新闻体制的废除为近代媒介转型阶段，1911—1949年为媒介制度的多元竞争阶段，1949—1978年为经典社会主义媒介体制阶段，1978年以来为社会主义媒介体制的转型阶段。

1949年以后，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的合法的制度供给者，博弈格局的改变使原有的政党媒介的两极格局迅速变成了一极格局，此前夹在两极格局中发展的文人论政型媒介（如《大公报》、《观察》）和商业媒介（如《申报》、《新闻报》）等也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无产阶级媒介制度最终变成成为唯一合法的制度形式。中国共产党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来源，将媒介演化的路径统一到“阶级斗争的工具”上来，延安解放区的模式得以在全国推广。知识分子从此失去了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影响力。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就一直贯穿着阶级斗争这一演化动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指导下，1949—1978年的中国媒介制度演化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驱动力的，越来越激进，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直接改变了晚清至民国以来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路径，以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重新设计”了中国的媒介体制：在媒介的所有制上，实行国有制度；在媒介组织制度上，将媒介设置成一个从事宣传工作的行政机关，媒介的人权、事权、财权和重大决策权由党委决定；在媒介的布局上，比照政府的科层制，四级政府四级媒介，条块分割；此外如“媒介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地方媒介要转载转播中央媒介的节目”，“媒介不得刊登广告”等制度也被设计出来。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制度重新开始演化，演化的方式是渐进的，分层次的。在媒介体制上延续了1949年以来的制度设置，在经营和采编制度上向企业化迈进，形成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的主体上来说，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与演化力量，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推广，1978年以来的媒介制度创新要么夭折，要么只能以“地下”状态存在。但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已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媒介组织自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很多制度创新是由媒介自发地创造出来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竞争压力及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内在驱力等驱使媒介进行制度创新，并反过来通过各种渠道驱使政府修改不利于自己追求利益的规则，或者出台有利于自己追求利益的规则，这样，媒介本身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者，这是在1978年以前的计划模式下所不会出现的。此外，其他利益集团，如商业阶层，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会有投资媒介的渴望，他们就会有修改现行媒介行业管理制度的动力存在；在正常的商业经营或投资中他们总是希望能够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量最透明的信息，因此他们会有对新闻自由、信息多元的渴望；当然，因为他们有钱，他们也会通过金钱的渗透来牵制媒介，修改媒介的管理规则、运行规则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外的商业利益集团将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转型时期也能够延续晚清、民国以来中断的“文人论政”的传统，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推动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轨迹，尽管这种推动力量今天看来还显得微不足道。

## 参考文献：

- [1] 顾自安. 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J]. 当代经济管理, 2006 (4): 12-17.
- [2] 李金铨.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 [J]. 2003 (6).
- [3] Gaye Tuchman.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68-90.
- [4] 李良荣. 新闻学导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29.
- [5] 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159.
- [6] 戴维·巴勒特. 媒介社会学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56.
- [7] 彼得·豪尔. 政治科学与三个制度主义流派 [A]. 何志俊, 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59.
- [8] Ransier S D.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4: (16).
- [9] L. E. 戴维斯, D. C. 诺思.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A]. 科斯, 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C].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68.
- [10] 张旭昆. 制度演化分析导论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汪丁丁.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08.